

## 美国政治极化的经济逻辑及其影响

余海燕 沈桂龙

[内容摘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本文分析美国政治极化及其背后经济逻辑的出发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美国这一全球化的构建者与推动者的国内政治,符合研判全球政治与经济格局变动和中美关系的现实需要。美国政治极化的持续要求我国在处理全球问题以及中美关系时做好充分的准备。当代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背后的经济逻辑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权利与政治权力的对立和统一造成美国国内阶层的分割与固化,贫富分化加速了经济的不平等,最终促进了其政治上的不平等;资本在全球攫取剩余价值伴随着国内岗位流失、再分配向资本家倾斜等,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收入分化;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不平等相互强化为政治极化。其国内社会问题尖锐而紧迫,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能根除,导致内政冲突加速外溢表现为霸权相对衰落下再塑利己国际规则的“再全球化”,以及通过大国竞争转移输出两党矛盾。了解美国政治极化背后的经济逻辑有助于中国更好地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关键词] 政治极化 再全球化 大国竞争 危机管理

[作者简介] 余海燕,西华大学特聘副教授;沈桂龙,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当代美国政治极化愈演愈烈,贯穿着美国的内政外交,深刻影响着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动。一方面,其国内多年积累的社会两极分化在金融危机与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达到新的历史高峰,另一方面政党极化进入“否决政治”的严重局面,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制度面临严重考验。

##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自 1990 年代以来,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化的趋势日益增加,意识形态分歧处于历史高位:在过去的几年里,共和党的大规模右倾和民主党的适度左倾使得两党中几乎没有中间派,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似乎将美国分裂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立阵营。<sup>①</sup> 针对这一现象,西方学者提出了诸多解释,主要包括(1)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导致个人支持意识形态极端的政党的可能性增加。<sup>②</sup> 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正在导致政治两极分化加剧,而且持续的高收入不平等将使新一代无法填补两党之间的差距;<sup>③</sup>(2)全球化冲击:全球化通过减少对当地制造业的需求(并因此导致失业)导致美国的两极分化加剧,尤其是与中国贸易更频繁的行业出现了更多的工厂退出、更大幅度的就业收缩以及工资收入的降低;<sup>④</sup>还会通过增加国民收入中最富有公民的份额而加剧不平等,<sup>⑤</sup>最终加剧了党派两极分化或民粹主义政党的投票。(3)经济危机和贸易冲击也会重塑国内收入分配和失业率,进一步加剧政治两极分化,如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大流行。<sup>⑥</sup>

大量文献研究了政治两极分化加剧的不利后果。联邦制国家中政党两极分

---

① David Autor, David Dorn, Gordon Hanson and Kaveh Majlesi, "Import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10, No. 10, 2020, pp. 3139 ~ 3183.

② Hernan J. Winkler, "The Effe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Evidence From European Regions, 2002 ~ 2014," *Economics & Politics*, Vol. 31, No. 2, 2019, pp. 137 ~ 162.

③ Francesco Perlasca,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An Empirical Application of Bonica's PAC-Nominate Model on the Ideology of Congress Memb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esi di Laurea*, 2021, p. 56.

④ David Autor, David Dorn, Gordon Hanson and Kaveh Majlesi, "Importing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Rising Trade Exposur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10, No. 10, 2020, pp. 3139 ~ 3183; Justin R. Pierce and Peter K. Schott,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6, Issue 7, 2016, pp. 1632 ~ 1662; Lorenzo Caliendo, Maximiliano Dvorkin and Fernando Parro, "Trade and Labor Market Dynamics: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China Trade Shock," *Econometrica*, Vol. 87, No. 3, 2019, pp. 741 ~ 835.

⑤ Andrew Q. Phillips, Flávio D. S. Souza and Guy D. Whitten, "Globalization and Comparative Compositional Inequality,"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2020, pp. 509 ~ 525.

⑥ M. Funke, M. Schularick and C. Trebesch, "Going to Extremes: Politics After Financial Crises, 1870 ~ 2014,"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8, No. 3, 2016, pp. 227 ~ 260; Yanfeng Gu and Zhongyuan Wa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Global Political Polarization: The Economic Origin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World,"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November 2021, pp. 1 ~ 24.

化延伸到政府间关系,会对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产生严重后果,<sup>①</sup>可能导致短视政策的实施,降低政府采取经济改革的机会,使经济更加低效,它还可能使商业周期更加不稳定并导致经济停滞,<sup>②</sup>这有助于解释美国的经济复苏为什么缓慢。严重时,这种政治两极分化会产生部落政治、激烈的选举和零和观念,从而阻碍合作解决世界各地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sup>③</sup>

美国政治极化存在以及不断增加的许多内外因都在被讨论以及被确认中,但这种现象的根源在西方学者眼中却显得难以描述或鲜有提及。保罗·皮尔森等指出政党竞争是民主的本质,但是麦迪逊政体的自我纠正机制可能已经被削弱,或者它们本身已经变成了两极分化的引擎:随着两极分化,政体的新发展会鼓励进一步的两极分化,极化存在着自我强化且加剧的方式。<sup>④</sup> 基于少数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政权的审视,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来看,本文认为美国政治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种内生现象。因此本文以马克思的资本权利作为逻辑起点构建分析美国政治极化的逻辑框架,试图探讨政治极化背后的经济逻辑如何贯穿美国的内政外交。

“两极分化”一词描述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之间日益扩大的意识形态差距,这种差距在过去20年中一直在明显扩大。<sup>⑤</sup> 政治极化的背后是经济的逻辑: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会产生极端的经济不平等,资本追求无限增值的本质最终会造成资本权利与政治权力的统一,加速资本积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资本首先是作为支配劳动的经济权利,然后逐渐转化为统治劳动

---

① Arthur Benz, “Federal Democracy and the Challenge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https://forumfed.org/wp-content/uploads/2021/11/Democracy\\_and\\_Polarization-1.pdf](https://forumfed.org/wp-content/uploads/2021/11/Democracy_and_Polarization-1.pdf).

② M. Funke, M. Schularick and C. Trebesch, “Going to Extremes: Politics After Financial Crises, 1870 ~ 2014,”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88, 2016, pp. 227 ~ 260.

③ Alban Lauka, Jennifer McCoy and Rengin B. Firat, “Mass Partisan Polarization: Measuring a Relational Concep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62, Issue 1, 2018, pp. 1 ~ 20.

④ Paul Pierson and Eric Schickler, “Madison’s Constitution Under Stress: A Development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 2020, pp. 37 ~ 58.

⑤ Francesco Perlasca,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Social Inequalities: An Empirical Application of Bonica’s PAC-Nominate Model on the Ideology of Congress Memb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esi di Laurea*, 2021, p. 56.

者的政治权力,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权利与政治权力相互强化,重塑了美国政治,最终导致政治极化。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运行的规律是资本不断积累,最终造成经济危机,这个过程伴随着扩大再生产与对外开放。因此,美国政治极化的经济逻辑有“内外”两条主线:

对内——生产资料私有造成资本和雇佣劳动在收入与财富分配上的先天不平等,最终必然导致贫富分化:资本主义的社会财富越增长,工人阶级也就越贫困,社会矛盾尖锐成为政治极化的国内温床。政治极化导致公共政策的产出困难,无论是促进经济复苏的结构性改革还是降低不平等的再分配政策都难以在两党间达成共识,经济危机也就成了必然,复苏缓慢而乏力,美国经济实力大幅衰减。

对外——资本“物的权利”<sup>①</sup>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扩张下世界市场形成,并在全球范围内加速资本积累,最终使财富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形成资本“人的权利”,加剧国内收入与财富再分配的两极分化。全球化红利的不平等惠及导致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崛起为政治极化的加速器。政治极化导致外交政策的矛盾反复以及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得势,降低了美国政治的国际影响力。同时,资本“物权”的正向价值促进了全球化红利惠及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崛起,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由此,过往长久维持美国霸权的资本力量,如今正在推动美国霸权的解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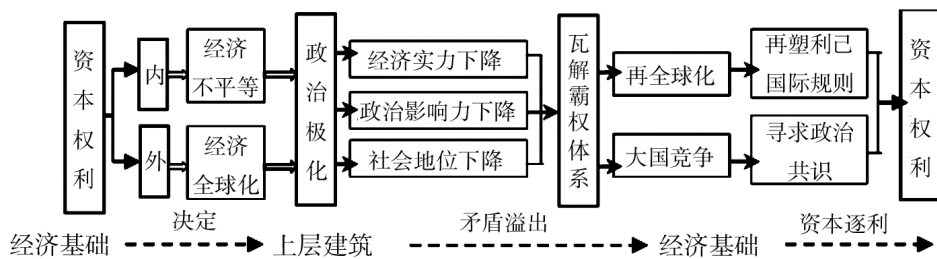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政治极化的经济逻辑及其影响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sup>①</sup> 资本“物的权利”即指资本权利的正向价值,体现为促成较高的生产效率和生产力。资本“人的权利”即指资本权利的负向价值,表现为少数人支配或者统治多数人。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其导致的政治极化只能缓解,造成的社会问题只能转移、输出。资本积累而产生的社会两极分化无法通过两党政治合作予以纾解,资本主义经济逻辑推动美国国内的矛盾溢出,具体表现为推动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多维全球化的反弹,打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崛起。

## 二、美国政治极化的内外经济逻辑

资本主义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性,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在西方国家集中表现为以贫富分化为特征的经济不平等和以两党对立为特征的政治极化。资本权利与政治权力的统一造成美国国内阶层的分割与固化,贫富分化加速了经济的不平等,最终促进了其政治上的不平等。资本在全球攫取剩余价值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社会分化。当前“再全球化”和大国竞争深刻影响国际秩序,其背后是美国国内政治矛盾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种延续。

### (一) 对内逻辑:资本权利重塑美国政治

马克思指出资本是“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sup>①</sup>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资产阶级占有以各种形态出现的资本,通过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攫取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作为支配劳动的权力,被施加于劳动者身上,实现价值增值和资本积累的目的,最终导致资产阶级和雇佣劳动者在经济上的不平等。而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必然导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转化为资本控制政治下的政治不平等。

#### 1. 资本权利导致贫富分化严重

马克思指出,相比其他权利,资本权利支配下的生产效率最高,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最高。<sup>②</sup> 在资本扩张的前期,扩大再生产能够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此

---

<sup>①</sup> [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页。

<sup>②</sup> [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222页。

时,资本权利更多表现为一种“物的权利”,其正向价值提高经济水平进而改善雇佣劳动的生活水平。而资本具有追求无限增值的本性,实现这一目的手段就是通过扩大再生产加大对雇佣劳动者的剥削,资本“物的权利”又使得扩大再生产成为可能。于是,同资本家财富快速积累相伴随的是工人贫困的更快速累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造就了资本的“人的权利”,结果必然就是社会的贫富分化。2018年美国国内基尼系数攀升至0.485,贫富差距创50年来新高。<sup>①</sup>美国最富有的50人与最贫穷的1.65亿人拥有的财富相等,1%最富有的人拥有的净资产是50%最贫困人口16.4倍。<sup>②</sup>贫富分化下中产阶级大量萎缩;1971~2019年,中产阶级家庭里的成年人占比由61%下降为51%。<sup>③</sup>

贫富分化造成了美国当今社会财富的倒三角结构:一方面富人财富越多,资本积累速度越快,另一方面,底层民众的财富增加速度小于经济整体的增长速度,更远远落后于富人财富的积累速度。1989年至2018年,美国最富有1%和10%的家庭占有家庭财富总额的比例分别从60%上升至约70%、从23%上升至32%,而最底层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且在家庭财富总额中所占比例从4%降至1%。<sup>④</sup>

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高度失衡,社会分裂,人口和财富倒三角结构不仅横向扩张,且固化不再流动,穷人群体和富人群体之间的界限愈加明显,底层和顶层的裂痕伴随中产阶级萎缩造成倒三角结构的断层出现。富者通吃与贫困锁定,阶级固化与流动停滞,经济不平等加剧可能导致更高的犯罪率,<sup>⑤</sup>健康状况不

---

①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http://www.scio.gov.cn/37236/37387/Document/1675341/1675341.htm。

②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http://www.scio.gov.cn/37234/Document/1700891/1700891.htm。

③ 牛霞飞、郑易平:《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危机:表现、原因及发展》,《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2期,第27~39页。

④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http://www.scio.gov.cn/37236/37387/Document/1675341/1675341.htm。

⑤ T. Enamorado, L. López-Calva, C. Rodríguez-Castelán and H. Winkler, “Income Inequality and Violent Crime: Evidence from Mexico’s Drug War,”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20, 2016, pp. 128~143.

佳,<sup>①</sup>以及较低的人力资本积累,<sup>②</sup>破坏和损害美国的民主,影响上层建筑的政治意识形态。

## 2. 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

马克思主义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资本本身是没有阶级性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造成美国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均衡,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势必滋生腐败,成为权力滥用的工具,破坏和损害政治机会平等,富人资产阶级进一步成为支配阶级和特权阶级,政治也成为特定经济利益关系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关系。从经济不平等到政治不平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在美国生产力发展的自由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经济不平等的先天性和寡头政治后天发展的缺陷性成为固有的长期特征。从资本掌控权利,到拥有资本的人掌控权利,政治以富人的利益为依归,经济权利决定了政治权利,政治选举沦为富人的金钱游戏:2020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的总支出高达140亿美元,是2016年的2倍多。其中,总统选举花费再创历史纪录,达到66亿美元;国会选举花费超过70亿美元。除公开登记的选举捐款外,大量秘密资金和“黑钱”充斥着2020年的美国大选。<sup>③</sup>选举不仅是候选人政策取向的较量,更是金钱的较量。握有雄厚资金的利益集团、捐款人与政治候选人之间事实上已经形成一种特殊的债权债务关系。<sup>④</sup>财富通过购买影响力、塑造大选结果、推动政治产出助推政治的不平等,反过来利益集团的当选者以维护富人阶级利益的政治方式予以回报,富人的政策偏好影响和决定了公共政策。即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反过来又加深了再次分配的不平等,经济不

---

① Richard. G. Wilkinson and Kate E. Pickett,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pulation Health: A Review and Explanation of the Evidence,"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62, No. 7, 2006, pp. 1768 ~ 1784.

② W. H. Chiu, "Income Inequality,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8, Issue 446, 1998, pp. 44 ~ 59; O. Galor, O. Moav and D. Vollrath, "Inequality in Landownership, the Emergence of Human-Capital Promot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Great Divergenc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76, No. 1, 2009, pp. 143 ~ 179.

③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9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 <http://www.scio.gov.cn/37236/37387/Document/1675341/1675341.htm>。

④ 李文:《美国政治中的“政党分赃”模式及其弊端》,《党课参考》2018年第6期,第122~115页。

平等与政治不平等之间相互强化,最终演变为政治极化。

如果个人收入是政策偏好的重要决定因素,那么收入分配的变化就会影响选民的选择:如果处于收入分配范围较低端的选民更有可能支持再分配政策,而更富有的选民更有可能反对这些政策,那么这两个群体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增加他们在政策上的分歧。<sup>①</sup>此外,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事实上选民确实变得更加两极分化,政党就需要争夺远离意识形态中位的选民。<sup>②</sup>弱势选民可能将激进政党视为他们最大的希望,因为他们与建制政党完全不同。失业率或经济增长恶化对弱势工人的影响最大,这将使他们在感受到移民威胁时更有可能支持极右翼政党。这意味着当不平等程度下降时(弱势工人变得相对不那么贫穷时),政治两极分化下降;当不平等加剧时(穷人变得相对更穷时),政治两极分化加剧。<sup>③</sup>1994~2017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党派分歧的平均差距从15%上升至36%,<sup>④</sup>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差距越来越大;同时,党内极端势力得势,1994~2017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趋于极端的比例分别由64%和70%上升为95%和97%,<sup>⑤</sup>党派间异质化与党内同化共同驱动了政治分裂,美国政治面临百年未有的政治极化。

## (二) 对外逻辑:资本全球化加速政治分化

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条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即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资本逐利的本质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做出了预判:开放是资本追求利润的结果。

### 1. 资本逐利造成选民分裂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美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才能攫取资本主

---

① Hernan J. Winkler, "The Effe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Evidence from European Regions, 2002~2014," *Economics & Politics*, Vol. 31, No. 2, 2019, pp. 137~162.

② James. C. Garand, "Income Inequality, Party Polarization, and Roll-call Voting in the US Senat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2, No. 4, 2010, pp. 1109~1128.

③ Hernan J. Winkler, "The Effe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Evidence from European Regions, 2002~2014," *Economics & Politics*, Vol. 31, No. 2, 2019, pp. 137~162.

④ 阙天舒:《从共识建构到极化解构—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思潮走向研究》,《学术前沿》2018年第11期,第57~67页。

⑤ 丁奎松:《美国中期选举评析》,《国际研究参考》2018年第11期,第1~11页。



义剩余价值。所谓全球化造成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不过是美国的大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结果。资本逐利推动了美国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变动——服务业能够产生比制造业更多的附加价值,研发设计、金融以及营销等环节居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具有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进而产生垄断优势。从分工地位差异转化为垄断竞争优势,是美国资本霸权建立的基础。在本轮全球化下,美国本土产业结构加快调整,产业根据分工效率在地理上集中,逐渐分化为代表不同利益团体或者阶级的区域格局,在总统选举中表现出明显的“红蓝之分”。1972~2016年,美国历届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安全州的数量由1个上升为21个,共和党安全州的数量由9个上升为25个,政治立场不安全州的数量由41个减少为5个,两党的选民日益变得更加“纯洁”,对所支持政党的信仰越来越坚定。<sup>①</sup>不同选区的利益通过选举制度得以表达,最终通过政策的施行得以实现,即政策反过来又强化了产业利益分配效应。以产业划分的区域格局通过所在选区的选票影响、塑造大选结果,那些左右摇摆的“不安全州”成为两党竞选执政党成败的最为关键因素。这就造成了总统竞选人为了得到该州的选票而去迎合该州的政策倾向,通过激进的、极端的言论、口号与政策方针来争取该州选民的选票,既强化了选民的政治倾向又反过来促进了政党竞选人的政治立场极化。

## 2. 全球化冲击再分配效应

尽管全球化可以通过增加收入来降低绝对贫困,但全球化可能改变国家经济中各群体的相对收入份额,从而加剧不平等,<sup>②</sup>引发随后的两极分化和分裂。一方面,全球化在给美国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恶化了美国国内的收入分配效应,即金融精英、资本家等高收入群体受益于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国内的中低端劳动者福利反而受损。全球化的收益并未在收入分配中均匀地重新分配,使收入分配更加向富人倾斜,加剧财富分化。另一方面,制造业转移和外来移民的涌入造成了原有产业工人的失业,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工和移民的

---

<sup>①</sup> 阙天舒:《从共识建构到极化解构——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思潮走向研究》,《学术前沿》2018年第11期,第57~67页。

<sup>②</sup> Andrew Q. Philips, Flávio D. S. Souza and Guy D. Whitten, “Globalization and Comparative Compositional Inequality,” *Political Science Research and Methods*, Vol. 8, Issue 3, 2020, pp. 509~525.

大量进入也拉低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扩大了贫富差距。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导致个人支持具有极端意识形态的政党的可能性增加。<sup>①</sup>同时,经济痛苦与贫富分化必然滋生极端民族主义、政治极端主义。<sup>②</sup>全球化抑制了民主政府的行动,为民粹主义者的崛起铺平了道路,他们利用未得到回应的社会保护需求来满足选举共识。<sup>③</sup>激进党派和民粹主义政客正是利用这一点,通过满足选民的需求并按照阶级路线动员支持者来寻求权力,于是进一步加剧民众对主流政治的背离,也使得达成政治共识变得越来越困难。在历届美国总统大选中,中间立场也不再是最佳选择,通过极端政治立场来争取左右摇摆的“不安全州”选民的选票,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恶性”循环反应。

### 三、极化溢出的内向影响:国际地位相对衰落

在经济逻辑的对内与对外作用下,美国政治极化的增加有目共睹。在政党、精英和民众都变得越来越分裂的情况下,极化的美国政治造成了政策制定、国会重要议题立法等政治产出变得异常困难,政治对立与僵局成为一种常态。

#### (一) 政治极化瓦解霸权体系

##### 1. 政治极化减少政府采取经济改革的机会

政治极化导致公共政策产出困难。第 80 届国会(1947 ~ 1948 年)中有约 30% 的提案无法通过,到了第 112 届国会(2011 ~ 2012 年)这一比例攀升为 71%,<sup>④</sup>第 116 届国会期间(2019 年 1 月 3 日至 2019 年 12 月 4 日),所提 11618 个法案只有 77 个通过,不通过率为 99.34%。<sup>⑤</sup>也可从政府关门这一现象看出——

---

① Hernan J. Winkler, “The Effe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Political Polarization: Evidence from European Regions, 2002 ~ 2014,” *Economics & Politics*, Vol. 31, No. 2, 2019, pp. 137 ~ 162.

② 李滨:《百年政治思潮与世界秩序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 年第 1 期,第 33 ~ 44 页。

③ Antonio Russo, “Hyper-Globalization and Capitalism: Socio-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Vol. 41, No. 5/6, 2021, pp. 584 ~ 596.

④ “Congressional Gridlock Has Doubled Since the 1950s,”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nk/wp/2014/05/28/congressional-gridlock-has-doubled-since-the-1950s/>.

⑤ 《这届国会不行—美式困境下“不中用”的涉港法案》, [https://www.guancha.cn/DuJia/2019\\_12\\_18\\_528726\\_s.shtml](https://www.guancha.cn/DuJia/2019_12_18_528726_s.shtml)。

资料显示,自1976年国会预算程序正式执行以来,美国政府一共停摆了21次,仅特朗普政府时期就发生了3次,其中2018年底美国政府遭遇了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停摆,长达35天。<sup>①</sup>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由于无法采取及时有效应对措施,经济复苏乏力而缓慢,叠加疫情导致的经济停滞,美国经济实力大幅衰退。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最终必然导致经济危机,无论是危机过后刺激经济复苏的方案,还是危机引发的结构性改革措施,亦或是缓解危机之后激增的社会矛盾的再分配政策,政治两极分化都降低了政府采取经济改革的可能性,<sup>②</sup>使得关键政策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美国实行两党制,民主党与共和党是美国两个主要的政党,两党通过竞选总统而轮流执政。一方执政则存在推翻另一方在任期间因妥协形成的政策决定的可能,尤其是当政治对立形成“为反对而反对”时,造成“否决政治”<sup>③</sup>的出现。短视政策的实施使经济更加低效,并且也是美国经济问题长期无法得到化解的根源之一。

政治极化意味着两个阵营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上的差异性越来越大,表现形式就是政治产出的困难。在政党和民众都变得越来越分裂的情况下,美国的政治就不可避免的走向极化。极化的美国政治造成了美国政策制定、国会重要议题立法等政治产出变得异常困难,政治僵局成为一种常态。两党的僵局与政治斗争达到新的高度,造成了美国国会的分裂与极化。

## 2. 政治极化降低其政治的国际公信力

一方面美国的政治极化导致国际社会普遍担心拜登政府做出的外交承诺或者方案被下一个宣扬“美国优先”的胜选总统推翻。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与拜登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的矛盾行为是其国内政治极化外溢国际的客观表现,两党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的对立造成外交政策的反复与矛盾,严重损害了其世界大国形象。另一方面,“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反映出美国既失去了提供全球重

---

① 《结束长达35天“停摆”美国府院之争结束了?》,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9-01/27/content\\_745413.htm?div=-1](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9-01/27/content_745413.htm?div=-1)。

② M. Funke, M. Schularick and C. Trebesch, “Going to Extremes: Politics After Financial Crises, 1870 ~ 2014,”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88, 2016, pp. 227 ~ 260.

③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93, No. 5, 2014, pp. 5 ~ 26.

要公共产品的能力又失去了承担全球治理大国责任担当的意愿。鉴于美国的多重危机,拜登政府很可能将精力集中在国内。<sup>①</sup> 拜登的“始于国内”也会进一步降低其承担国际责任为全球提供重要公共产品以维持国际秩序正常运转的意愿。近年来不断透支的战略信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政治领导力。

在美国霸权的单极时代,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看不到其他可行的政治制度选择。而中国的崛起和抗疫成功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让全世界看到了除资本主义制度之外的其他可能的选择。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却无法成功引领全球抗疫,甚至一度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致使更多的普通民众陷入了贫困与疾病,成为全球抗疫的绊脚石。政治极化导致难以形成战疫合力,严重降低了美国的政治公信力。

### 3. 新兴大国崛起,美国霸权地位相对下降

从全球层面看全球化福利的不平等导致国家实力非均衡增长,助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高潮,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来全球性的影响力。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动摇了美国“一超独霸”的绝对领导优势,发展中国家拥有了更多话语权。全球化加快了资本的积累速度,美国的经济制度却无法在国内进行全球化利益和财富的重新再分配,全球化财富大量流入极少数人手中,反而加剧了国内贫富分化,加快了社会撕裂,外部霸权失去了内部稳态的经济均衡作为支撑。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仅处于下降状态,而且维持其霸权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力量正在瓦解。

#### (二) 资本积累导致霸权必然衰落

世界市场的形成造就了美国的霸权地位。1894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英国,是美国世界霸权的开始。随后的二战、苏联解体、美元本位制的确立等从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为美国建立起了世界霸权体系,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

<sup>①</sup> Maurice Obstfeld,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Vol. 39, No. 4, 2021, pp. 675 ~ 690.

一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使得美元这种“特殊”的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地进行劳动剥削和财富掠夺,从而美国国内财富与收入的两级分化也更为迅速。在经济逻辑的内外双向循环作用下,政治出现极化的周期性高峰,<sup>①</sup>导致经济、政治与社会等多方实力衰退,推动瓦解其霸权体系。

另一方面,单一霸权是一种不稳定的经济结构。资本的无序扩张最终必然导致严重的危机,瓦解美国的内部根基。且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动摇了美国“一超独霸”的绝对优势,发展中国家拥有了更多话语权。美国国内存在着许多制度性瓶颈问题无法解决,拜登政府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现实困境。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剩余价值决定了制造业回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传统白人蓝领的地位继续下降,资本积累只会激化这种社会矛盾。同时,资本的国家属性归根结底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于是资本建立起美国的霸权体系,最后又必然推动其霸权体系的解体。

#### 四、极化溢出的外向影响:再全球化与中美竞争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阶段性导致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断出现,美国霸权体系的不断瓦解似乎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解决不断袭来的全球性危机的乏力。资本的“物权”促进经济增长与资本的“人权”加剧社会极化体现了资本的自我矛盾:一边促进发展中国家崛起,一边又造成美国相对霸权衰落。当美国认为全球化更多地促进了两极格局的形成时,于是借“逆全球化”推动全球化重塑利己国际规则体系。

##### (一)“再全球化”塑造利己国际规则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逆全球化”被视为选民和政党向保护主义和孤立主

---

<sup>①</sup> 考察相关数据发现极化程度存在一种周期性涨落的现象,比如美国建国初期、内战前、罗斯福新政时期等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两极化和两党尖锐对立。

义方向的政治转变,对政府的倾向和制定政策产生了实质性影响。<sup>①</sup>许多选民将收入分配恶化归因于商品、资本和人员的全球流动性。<sup>②</sup>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促使对全球化的怀疑急剧上升,最贫穷的人承受着最高程度的痛苦和负担,导致无家可归、失业、粮食不安全和普遍的经济困境。机会主义政客利用这种对全球化的怀疑和敌对以及煽动民粹主义来增加社会分歧,使群体相互对抗。<sup>③</sup>“逆全球化”在美国国内拥有深厚的社会与民意基础。同时,单一霸权的确立意味着二战之后的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全球化下的国际分工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美国牢牢占据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高端环节,攫取大部分剩余价值。因此,美国只有不断塑造占据绝对优势的国际规则体系获取源源不断的霸权权利才能够维持其特定利益逻辑。

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化包括由于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的更自由流动而导致国家边界的全球模糊,从而导致国际交易价值相对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上升。因此,逆全球化背后的原因除了政治性的(这个从本文的逻辑来看被证明根源也是经济性的),可能至少部分地是全球化的,即逆全球化的内生因素是经济性的。全球化的分配后果导致美国内部社会群体和地区之间的两极分化越来越大,这些全球化驱动下的负向变化导致对主流政党和候选人的政治失望,导致对反建制和反全球化力量的更高支持。<sup>④</sup>资本积累到达一定阶段造成全球化、民主和国家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之间悬而未决的矛盾凸显,<sup>⑤</sup>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追求剩余价值的本质没有改变,当社会福利的增加不足以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时,通过

---

① Italo Colantone and Gianmarco I. P. Ottaviano and Piero Stanig, “The Backlash of Globalization,” *Cesiso Working Papers*, No. 9289, 2021, p. 1.

② Jeffrey Frieden, *The Politics of the Globalization Backlash: Sources and Implications*, *GRU Working Paper*, No. 1, 2018, p. 24.

③ Matthew Rochat, “A Crisis of Globalization: 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ace Studies, and Development*, Vol. 6, Issue 1, 2021, pp. 2 ~ 23.

④ Italo Colantone and Gianmarco Ottaviano and Piero Stanig, “The Backlash of Globalization,” *Cesiso Working Papers*, No. 9289, 2021, p. 1.

⑤ Dani Rodrik,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2011, p. 368.

逆全球化的行为达到再全球化的目的,最终为资本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剥削创建合法性国际规则就成了美国当前缓解各方危机的重要手段。

全球化进程处于危险之中,新冠肺炎危机是又一个关键性分水岭。<sup>①</sup> 伴随着政治失序、种族冲突与社会撕裂,美国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疫情应对不力,造成惨重后果。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汇编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月25日,美国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超过86万,感染和死亡总人数占全球比例高达20.19%和15.5%。<sup>②</sup> 老人和更多的贫困人口成为美国抗疫不力的牺牲品。美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亟需通过再全球化寻找外部突破,以寻求足够的利益稳定内部冲突。

## (二)借中美竞争寻求政治共识

2021年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发布的《新的大国竞争:对国会国防议题的影响》报告指出中美大国之间的竞争关系。<sup>③</sup> 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下全球经贸格局的加快调整又进一步引发美国的政治敏感。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新兴崛起力量、抗疫成功的社会主义制度典范进一步引领了世界经济的复苏,成为全球化的支撑力量,与美国的“再全球化”形成相反的力量。

长期以来,西方普遍认为中国的冲击导致美国的大量失业和工资下降,中国对特定行业和地区冲击的集中影响,使贸易的经济后果变得显而易见,因此在政治上也很突出。<sup>④</sup> “中国威胁论”一直是美国政治选举周期中最重要最常见的主题之一。目前,美国两大政党基本上都处于贸易怀疑的阵营,<sup>⑤</sup>就中国进口商品冲击导致国内失业率增加以及中国崛起享受了全球化红利却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等观点是两党能达成的为数不多的共识。美国已经有了冷战后独享单极霸权的

---

① Matthew Rochat, “A Crisis of Globalization: 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eace Studies, and Development*, Vol. 6, Issue 1, 2021, pp. 2 ~ 23.

②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③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newe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mplications for Defense-Issues for Congress,” <https://sgp.fas.org/crs/natsec/R43838.pdf>.

④ Rafael Di Tella and Dani Rodrik, “Labor Market Shocks and the Demand for Trade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Online Survey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30, No. 628, 2020, pp. 1008 ~ 1030.

⑤ Maurice Obstfeld,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ism: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Vol. 39, Issue 4, 2021, pp. 675 ~ 690.

体验,因此它对两极格局会产生更大的排斥并将这种排斥转化为更强大的遏制动力。<sup>①</sup> 这背后的原因是美国内部政治极化无法解决社会矛盾导致实力衰减,才会促成发展中国家更快的追赶,以及制造中国问题转移国内矛盾的焦点。其背后的经济逻辑仍然是维护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构建的以美国为核心的不平等交换体系,维护美元资本对发展中国家廉价劳动力的剥削,遏制新兴力量崛起能够暂时维持美元资本对其他政体的支配权利。

多数学者认为当前中美关系无疑已经进入全面竞争时代。中美全面竞争时代,包含合作、竞争、对抗、冲突四个方面,合作服从于竞争,竞争有时还会服从于对抗。<sup>②</sup> 中美关系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两国关系不是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是全球性、区域性的多边关系。2021年2月19日,美国正式再度成为《巴黎协定》缔约方,代表着美国重回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目的是积极塑造其大国担当的国际形象,挽救政治领导的国际权威性的衰落,试图通过重塑美国经济和产业,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力和竞争力。但是美国政府的“否决政治”僵局仍然是美国内政外交的关键影响因素,因此重回多边贸易体制在极化政治的影响下,美国对华战略仍然是竞争性大于合作性。

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中美大国竞争关系的核心要义是危机管理。中国所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使得中国对管理中中美两国关系不是盲目自信的“安全管理”或者主动挑起冲突的“应急”管理。中美两国的制度、意识形态、国情不同,决定了两国不会永远处于合作的状态,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也决定了两国不会一直处于冲突对抗的状态。一般而言,国家对经济相互依赖的政策反应主要有五种:消极的、剥削的、侵略的、防御性的和建设性的,其中,美国的政策反应无疑是消极的、剥削的和侵略的,中国的政策反应则是防御性的和建设性的。<sup>③</sup> 对于我国而言,在美国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下,有组织的政治战是大国在竞争中

---

① 姜鹏:《边缘诱捕:两极权力竞争背景下弱势超级大国反遏制战略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4期,第113~134页。

② 《拜登时期的中美关系何去何从?——郑永年等学者谈当前中美关系》,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2395454](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2395454)。

③ 李孝天:《经济相互依赖视角下的中美贸易冲突:成因、启示与前景》,《国际关系研究》2019年第5期,第109~135页。



夺取胜利的关键,我国更应该做好对美国政策极化的防御性与建设性应对。这种防御性与建设性的应对是中美关系危机管理的核心,是出于对两国关系可能持续恶化而做的预防性准备,是针对大国外交冲突升级而做的“关口前移”的预防性工作。鉴于美国最近频频挑起南海事端,插手我国香港事务,中美两国关系存在危险性与不确定性,美国挑起的事端也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威胁性与突发性,因此保持“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建立快速高效的危机反应机制、储备应对危机的战略手段至关重要。在中美关系危机管理中,应将解决危机的关口前移,在摩擦进一步升级之前保持同美国的对话沟通,及时化解危机,避免危机升级。

### 五、结语:政治动态与全球化的未来

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发布的“2021年世界十大风险”报告中,将美国政治分裂列在首位。<sup>①</sup> 而其“2022年世界十大风险”又认为中国新冠“清零”政策的可能失败是全球最大风险。<sup>②</sup> 由此可见,美国政治、中国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未来世界格局变动的重要影响。

当前,美国国内多年积累的社会矛盾与经济顽疾导致其政治极化在21世纪的今天达到新的高峰期,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多重失衡无法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政治制度面临严重考验,如何在解决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的同时,又能利用资本权利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再反过来巩固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支配权,使得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新冠肺炎危机又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失败。内忧加外患下美国的“再全球化”行为恣意高涨,旨在进一步维护其资本在全球剥削剩余价值的合理性与合规性。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是大萧条之后能够对全球人类造成重大影响的危机事件,成为当下以及未来很长时期内具有决定性发展的危机事件。

---

① Eurasia Group, “Top Risks 2021,” <https://www.eurasiagroup.net/files/upload/top-risks-2021-full-report.pdf>.

② Eurasia Group, “Top Risks 2022,” [https://www.eurasiagroup.net/files/upload/EurasiaGroup\\_TopRisks2022.pdf](https://www.eurasiagroup.net/files/upload/EurasiaGroup_TopRisks2022.pdf).

随着世界经济再一次面临转型期,疫情加速了国家回归的趋势,各国不得不介入自由经济体系,利用国家的主权权利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刺激经济复苏。而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可能的长期化趋势,以及高度互联的全球化网络下危机传导的迅速性,区域化、分散化、近岸化等趋势都在不断得到加强,多国都在向“在地化”“根植性”发展回归,内向的本土主义政策相继出台进一步加大了全球化回溯的可能性。因此,积极利用全球危机重塑美元资本的霸权成为决定美国政治决策的基点。总体而言,全球如何成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以及一系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下的经济危机事件,美国如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总体结构变革在政治上更具可持续性,中国如何处理同西方大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化的未来。